探索当代农民的精神出路

——车弓长篇小说《太阳正在升起》浅析

宁波 书香海曙 好书评选 ELEGANT HAISHU

袁志坚

2019年1月25日，车弓长篇小说《太阳正在升起》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十楼会议室举行。这部百万字的精装本，分“吼山记”“出山记”“归山记”三卷，由作家出版社和宁波出版社联合出版。作为责任编辑之一，我在研讨会上发言，表达自己对作家车弓的敬重与对这部作品的推崇。

《太阳正在升起》作品厚重，首先在于它的主题重大。2010年，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两富浙江”的任务，即浙江人既要在物质上富裕，又要在精神上富有。《太阳正在升起》聚焦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星星草集团从一个村办小工厂发展成为资产10亿元的企业集团，可是，村支书、“星星草”的当家人憨佬却自问，“为什么在致富的过程中，这代人下代人却离理想信念越来越远？物质上丰裕了，精神上为什么荒芜了？”显然，在他看来，精神上的成长比物质上的获得重要得多。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小说紧扣“太阳升起牛抬头”的画面来挖掘憨佬、油嘴佬两代人的精神世界，从牛到人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社会身份的转变，而是牛抬头后如何识路的自我进化，是农民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起完成自身观念的变革。车弓奔着描绘当代农民的“精神面相”这个使命去写，他写得很艰难也很深入。正如他在后记里所说：“前进的人们灵与肉是分离的，肉身已在彼岸，而灵魂却留在原地。”其实，现实无时不在撕扯着处于社会急剧转型之中的农民，他们挣扎着创造成为人的历史，但是，他们又有着“牛”的局限。灵魂难以跟随被推上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的肉身，一旦灵魂被肉身抛弃，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这里面的含义非常深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的脱贫致富精神被概括为“走遍千山万水，叩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经历了这样的磨练还不够，还需要跋山涉水去真正实现人的发展。也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憨佬的自杀、叹息油嘴佬的背叛、憎恨四眼哥的堕落、可怜菲菲的卑贱，才会更加关注农民的精神世界。

这部作品厚重，还在于它的写法独特。车弓出生、成长于慈溪农村，做过多年的财经记者，他熟悉浙东沿海农村，熟悉改革开放以来慈溪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过，他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来写这部献给父老乡亲的书。退休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从北京回到慈溪，采访了许多人，因此《太阳正在升起》的文体是介于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车弓说，这是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致敬，因为她也是记者出身，擅长用一种非虚构的手法来记录历史。车弓是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来写的，所以，他用了三卷的大容量来展开历史的细节，展开现实的褶皱。也只有这样大的容量才允许他用13个角色的口述来还原真实。多角色转换、多场景转换、多视角转换，这13个角色是相互审视的，是交叉验证的，同时又是集体回忆、共同叙事的。谁在书写历史？不光是作者，不光是13个讲述者，不光是其中的访谈、书信、电子邮件，更是一种反复性的、交错性的、融合性的声音。历史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复调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太阳正在升起》这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也许是合适的，便于读者拉开同每一个讲述者的距离，拉开同现实的距离，用更深远的历史眼光来衡量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厚重，更在于它的人物丰满。憨佬、油嘴佬、菲菲、志潮秀才……这些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不是平面化、漫画式的，充分显现了人性的复杂，也充分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车弓是把人物放到历史进程中描写的，写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写出了世俗流弊对人物的欲望、情感、观念的影响，通过曲折的情节写出了曲折的人性。尤其是憨佬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硬气而深情，憨厚而精明，善良而决绝，执拗而大度，他身上有着传统文化的深沉气质，当然，也有落后、武断的一面。这个人物一看就是从浙东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

车弓孜孜不倦地描绘着当代农民的“精神面相”，同时，他也和他们一起再次抬起头来，探索精神的出路。

散文是一把密钥

——《从一个蛋开始》读后

赵青新

《耶路撒冷》写了6年。为什么这么慢呢？徐则臣解释说：慢是因为复杂。人物多半是走走停停、愁肠百转，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能让他们沉溺其中。这番话写入《耶路撒冷》一书的跋，标题是《能有多复杂，就有多缓慢》，现收于《从一个蛋开始》这部散文随笔自选集中。集子收录了38篇文章，分为两辑。第一辑叫“冬至如年”，属于回忆性叙事散文；第二辑叫“孤绝的火焰”，是一些书评和旅行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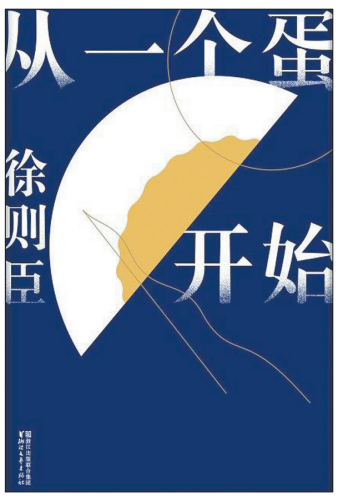
专门的散文家往往各有所长，或雕镂文字，或说理分析，或铺张浓意，或经营淡味，总要使文章有动人之处。散文之于徐则臣，我想多半只是一种副产品，他未见得像写小说那样周密筹划，下了多少心力，但功底终究在那里，所以自有其动人之处。

徐则臣的作品底子是如何造就的呢？

第一，乡村生活。童年是每个人记忆的起点，徐则臣的散文里有一种幽幽的乡恋。牧童晚归横笛，幼时的放牛生涯早已隐入时间深处，时间是一条浩荡的长河，早年的生活就像河道，指引了方向。同为“70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故乡”可言，还会记得黄杨木的门板咿呀作响，晨间田垄上弥漫的雾，还有算命先生这样的“异人”。长大后，我们这一代人纷纷离开了故乡，为了求学，为了工作，在其他的地方生根发芽。我们懂得中关村外那口麻辣烫的滋味，难掩近乡时“故人日以稀”的心绪。不管走多远，乡愁总是追在身后。

第二，读书生活。若没有读那么多的书，放牛娃大约难成大作家，或者是另一种写作风格。看得出来，西方文学对徐则臣影响至深。同名文章《从一个蛋开始》，以一个蛋面对一座高墙的隐喻，书写卡夫卡的孤寂、阴郁与冷漠。徐则臣说他不喜欢卡夫卡，也不喜欢卡佛，而这种不喜欢，恰是在他被深刻吸引之后产生的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扬弃。他也侃侃而谈萨拉马戈、黑塞、贝恩勒夫……当他站在华语文学传媒的领奖台上时，他说在深入对自我的认知、对文学的理解，并努力在新的起点和向度上展开个人表达。

两种生活，相互交融，在他脚下垫起了高度。《耶路撒冷》构筑了“一代人的心灵史”，其中“经验与虚构”的关系，在徐则臣的散文里能找到很多痕迹。比如《贵人》这样起笔：“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瘸腿女人，她跟我说，‘你总有贵人相助。’”显然此处有小说的笔法。后面写几次遇见，写流言，写恐怖，写不安，写女人的不知归处。最后写道：“这个自称是我贵人的女人，我知道的不会再多了。”既是散文，亦是真事。这里是否有着《耶路撒冷》的一些意象呢？隐秘、背负、忏悔、救赎，渴望获得平静，类似这样的故事，也许体现了徐则臣小说的“根系”，他的世界在其中慢慢形成。



这种“准小说”的味道，显然是这部集子的一大特点，写人，写事，写情，格外生动。散文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信笔驰骋，可直抒胸臆，仿佛授人一把密钥，把心口摊开了给人看。现象的保存和记忆的发酵，经时间的过滤和处理，历久而弥新。阅读本书，也就好像拿到了徐则臣给我们的一把密钥。

见豆腐如见故人

——读《中国豆腐》有感

矩 形

从书架上取下《中国豆腐》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小开本，四四方方的素白封面，就像托了一方白玉豆腐在掌上。装帧过于寡淡了？不会啊，一指来宽的红色腰封从封面中穿过，瘦金体的“中国豆腐”四字，透出恰到好处的中国味。

很多人认识林海音，是因为《城南旧事》，完全没想到她竟然会编《中国豆腐》这样一本“接地气”的书。手头这本由林海音主编、其女儿夏祖美和夏祖丽助编的作品，并非最初版本，而是经过增订的新版。因此，不但能看到旧版中的文章，更能看到初版后众作者对中国豆腐新的了解、感悟以及对原有文章的回应及修改。在分类方面，林海音也重新做了安排，分为五个篇章，分别是：“散文豆腐”“考据豆腐”“家乡的豆腐”“海外吃豆腐”和“豆腐菜单”。正如主编者所说，《中国豆腐》既不是“纯文学”的，也不是“纯食谱”的。在我看来，那些文章就像一道道下了心思的豆腐美食一样，上得了台面，经得起品尝。

豆腐是每个中国人的食品，不管是家庭饭桌上还是豪华餐厅里，都少不了它。林海音念念不忘的豆腐与一场离别有关，“搬离要拆改的木屋进入高楼大厦居住时，最后的那天凌晨，仍是二十多年来阿婆的那一声：‘豆腐——豆干炸哦——’把我从梦中喊醒了。张眼望窗外，天亮了，正是：豆腐一声天下白！”在此后的数十年岁月中，作者一次又一次地体会着豆腐的神奇之处：豆腐可和各种鲜艳的颜色、奇异的香味相配合，能使樱桃更红，木耳更黑，菠菜更绿。它和火腿、竹笋、蘑菇、牛尾、羊杂、鸡血、猪脑等没有不结缘的。当忙碌或食欲不振的时候，做一味香椿拌豆腐，或是皮蛋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佐餐，都十分可口。时间允许，做一味麻辣烫三者兼备的好麻婆豆腐，或煎得两面焦黄的家常豆腐，或毛豆烧豆腐，绿的碧绿，白的洁白，只颜色就令人醉倒了……读此段文字，齿颊留香的同时，也佩服作者的精准概括——“豆腐像孙大圣，七十二变，却依然保持着本体。”

在这本集子中，最有看头的自然是“散文豆腐”和“海外吃豆腐”，每位作者诉说着令人怀念的各式各样的豆腐，实际上也袒露着他们各不相同的生活姿态。梁荣若先生的豆腐印象牵连着故土：“几回从昏睡里看到了无边的豆田，黄荚累累像河套，像松花江平原，也像故乡滋河的弯曲处！”因为海外读书的缘故，豆腐成为彭歌魂牵梦萦的吃食，在他看来，天下事往往如此，极平常的东西，一旦得不到，就会“想”得不得了。“一个不懂得欣赏豆腐之美的人，大概不能算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或中国的生活方式吧？”所以，中国留学生之间，若是有谁在周末买到豆腐，“必然要各处通电话，呼朋引类，以‘红烧豆腐’共进晚餐，客人必感激盛情，称谢再三。”孔瑞昌先生的豆腐之思里露出中国文人的自得：“豆腐通常被人认为本身没有滋味，所以总是作陪衬……豆腐的这种退让谦虚的本质，和它调和中庸的能力，正符合道教的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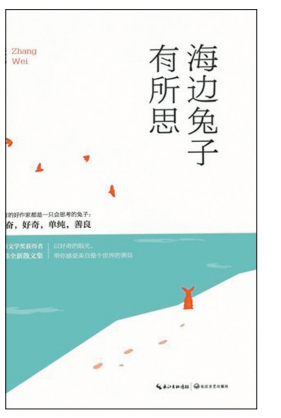
在“考据豆腐”一辑中，《豆腐考》的作者筱田统从相传公元前二世纪汉淮南王刘安的发明说起，不过，“豆腐”一词未见于《淮南子》一书，亦不见于其后的《说文》《释名》《广雅》《博物志》《齐民要术》等各类字书和农书。作者不肯罢休，继续在中日文献中一路追溯，直到宋初陶谷的《清异录》。这是筱田统所能追索到的关于豆腐的最早文字记载：“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陶谷是五代后期至宋初人氏，因此他记录的时戢的逸事，当在宋初或稍早时期。青阳属于安徽池州府，据此可知，豆腐至少在当时的江南一带已普遍成为肉类的廉价代用品。

在“家乡的豆腐”一辑中，林海音津津乐道于各地的豆腐美食，什么北平的“王致和臭豆腐”、山东日照的“满头黄”、湖南长沙的“畏公豆腐”，什么安徽休宁的“炸烤长毛豆腐”、南京的“太平干”、江苏扬州的“干丝”，文章既述源流、特色，亦讲口感、做法。此外，还有徐木兰的“花生豆腐”、卜昭祺的“鲁东的斤豆腐”、廖明进的“豆腐泥鳅”等，这些各具风味的豆腐美食，抚慰的不仅是人们的胃，还有那颗思乡的心。

豆腐还是那块豆腐，让豆腐化平凡为神奇的其实是作者们一言难尽的乡愁。如果沿着“城南旧事”的思路怀想，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豆腐也许就是林海音的“中国旧事”之一，用它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切入点，实在合适不过。见豆腐如见故人，一块小小的豆腐，既连接历史，又关乎人情，苦辣酸甜，可见人生。

荐 书

《海边兔子有所思》



作者	张 炜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8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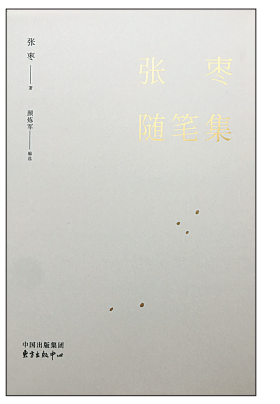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长篇乡土小说《古船》一经问世便震惊文坛，让人们记住了作者张炜的名字。30多年来，张炜笔耕不辍，无论是《古船》《九月寓言》，还是《刺猬歌》《独药师》，他的作品常常弥漫着浓郁的大海气息，给人以空山新雨般的清新感。收录了张炜住在海边“一些场景和心情”的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绚丽多姿。

“如果一个写作者胡编乱造，就不如记录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好。”正如张炜所言，《海边兔子有所思》深得自然之意趣，其内容关乎写作、思考与时间，或睹物思人，或借景抒情，追忆了许多人生逸事，梳理了若干的创作细节，其意义早已超越随笔之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作者的精神自传。许多文章充满了趣味性，看似信手拈来，却能以小见大，借助于兔子的形象，展示了“原生态”的生活，表达了对自然、人生及文学的独特见解。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成为好的作家？这是张炜长期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一位好作家应该拥有两颗宝贵的心：童心和诗心，这是文学创作的初心，更加接近生命之本色。作为“守望大地”的精神坚守者，张炜希望通过“打动了林中万物”的作品发出自己的呼喊：“‘向往自然’不仅是一个文学的主题，也应该变为一座城市的主题。”

“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诚哉斯言！文学创作的过程，犹如身负重壳的蜗牛，努力向前爬行，虽步履缓慢，但勇往直前，在漫长的旅途中找寻精神元气。

（推荐书友：戴骏华）

《张枣随笔集》



作者	张 枣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日期	2018年7月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在这首流传甚广的《镜中》诗里，诗人张枣以其独特的抒情，让读者感受到优秀诗歌的朦胧之美。

本书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欣赏和创造诗歌之美。张枣无疑是快乐的，他在《销魂》中说：“写诗的日子是销魂的，无以替代。”“诗如针眼，肉身穿过去之后，别有洞天。”他同时还说：“诗歌使我们的夜晚还有梦想，也试图使我们的白天充满意义。”

对于如何找到欣赏诗歌之美的途径，张枣在《自己的官方》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好的写者漫无目的，不求闻达，只愿表达。生存美得难舍，虚无饱满而绵甜。”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一文中，张枣更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静，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有诗意的质量来确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在《一则诗观》中，诗人仍强调语言才是把握好诗尺度的关键。

张枣曾经自问：“生活如此广阔，为何一定要写诗？”换言之，在快节奏的当今时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诗歌？诗人给出了响亮的回答：“诗的危机就是人的危机，诗歌的困难正是生活的困难。朝向危机，朝向危机不可言喻的困难和追问，是人类诗歌创作最深沉的动机，这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

（推荐书友：虞时中）

《消失的古城》

作者	王 笛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月

《消失的古城》是王笛原来发表在“腾讯·大家”专栏上的文章的结集。专栏定位于大众通俗写作，以材料叙述为主，理论分析浅尝辄止，所以整体呈现为浅显的普及读物。30篇文稿构成了本书的30章，以成书而言，大约仓促了些，难免让人觉得主题重复、结构松散，但《消失的古城》所做的梳理仍有意义。

王笛对故乡成都的爱由来已久，早前他出版的《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以一个个切面逐渐深入这座城市的肌体，而《消失的古城》可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追寻，清末民初的成都历史、文化、日常生活，诸种味道飘散于字里行间。

本书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三：第一，海外的中国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对西方的旅行者、传教士、新闻记者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们留下了许多现场目击的图像和文字。比如外国人拍摄的晚清街头的木偶戏、流动的剃头匠、蹲守的轿夫等。第二，民国报刊。比如《通俗日报》《国民公报》等留存了许多漫画或段子，有逸闻趣事，也有世态人情。由刊于1914年《通俗画报》的一幅有关麻将风波的时事讽刺画，王笛指出，“在成都，麻将曾经是犯罪”。再引述歌谣、报道、名士如胡适等人对麻将的态度，饶有趣味地剖析了成都特有的“麻将文化”。第三，竹枝词。这种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而成的诗体，时常被民国文人用以生活记事。比如有竹枝词云：“门外忽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叮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生动描摹了小商小贩走街串巷的情景。

《消失的古城》写老成都，最后落脚于老城改造和城市景观保护。怎样做到新旧平衡，既保持原味，又具备活力，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大命题。

（推荐书友：林颐）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